

上接《E1

“海上丝路”的中国意义

中国东南沿海的文化,与东亚、东南亚乃至环太平洋文化圈也存在某种联系。中国考古学家吴汝康等认为,上述不同地区出土的古人类遗骨有若干相似的特征,这暗示着,亚洲原始人类从中国南部逐渐迁往东南亚和澳洲的潜在途径。而这条路径,很可能是史前航海民族之间互相交往的桥梁。

另一位中国考古学家苏秉琦更指出,中国东半部的史前文化,与环太平洋诸文化可能存在源流关系,中国中部、西南部,特别是华南到云贵高原一带,与印度次大陆发生联系,并在那里与印欧语系诸文化因素相衔接。

众所周知,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记载了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求仙的故事。有说法称徐福“东渡”目的地就是日本,也有指徐福船队的出发港在河北黄骅,或山

东风西渐 万里无间

当时罗马帝国有一种诱人的皇家香水“快乐之极”,它的原料中香草来自印度,豆蔻来自尼泊尔,金合欢来自缅甸,松香油来自中国。

1900多年前,古罗马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普林尼说过的一段话,至今仍耐人寻味:

在世界不同地方保持这种不间断的贸易往来,正如人的身体吸收营养一样,是十分有益的!我们应该把它归功于罗马帝国所营造的广大和平氛围,这不仅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能正常进行,也使产品之间的交换能顺利发展……鉴于世界各地的开放、沟通与交流,鉴于罗马帝国的威仪天下,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,文明之所以获得了如此大的发展,应得益于与日俱增的商贸往来与和平的环境。

撇开话语之中洋溢的“帝国自豪感”不谈,普林尼让后世的人们意识到,在所谓“罗马和平”时代,西方人从活跃的东西方经贸活动中,享受到了多么丰盛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福利。

罗马人对海上运输与海外贸易保持高度热情,风平浪静、岛屿众多、港湾密布的地中海,把南欧、非洲和亚洲联系起来,成为罗马帝国商业交通与海上贸易的重心。

陶瓷造纸 丝路相传

16世纪,意大利人发明的用伊斯兰方法仿制中国白瓷的技术,在西欧普及。后来,中国瓷器得到大量自由仿制,一个欧洲陶瓷业新时代来临了。

伊斯兰教“圣训”记载了创始人穆罕默德的一条训教:“学问,即使远在中国,亦当求得之。”

这条训教也许出自后世,但确曾促动一些伊斯兰信徒来中国寻求学问。它也从一侧面反映出,同一时代高度发达的唐朝经济文化已远播异域,令海外各国敬仰不已,即使是远在西亚的阿拉伯世界,也通过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接触,感受到了唐帝国的雄强与大气。

中国的文化技术早就受到阿拉伯人的关注和赞赏,许多中国器物为阿拉伯人所用,其制作技艺也由其向西方辗转传播。据说,欧洲中世纪的精陶陶器,一直受到东方的影响,其直接灵感来自伊斯兰世界,而审美情趣与技术,则受到中国陶瓷的熏陶。

公元1世纪以后,中国陶瓷陆续销往

东北海岸(包括登州),或在山东胶南利根湾、江苏赣榆县大港口,莫衷一是。徐福的故事,当然不能完全视为信史,但可以相信他确有其人,有关的传闻反映了公元前2世纪左右,东亚地区以海洋为通道进行文明交流的境况。而公元1世纪前后,中国沿海地区的国际性海洋活动更明显增加。

时光越千年,到了八九世纪以后,世界海路大通,唐朝的交州(今属越南)、广州、泉州、明州(宁波)等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。“广州通海夷道”是古代连接中国珠江口到波斯湾地区的主要远洋航线,也是东西方最重要的海上航线。

据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记载,这条海洋航线,从广州起航后,穿越南海、马六甲海峡,进入印度洋、波斯湾,再沿波斯湾西海岸航行,出霍尔木兹海峡后,可以进入阿曼湾、亚丁湾和东非海岸,途经90余个国家和地区。在8~14世纪,东西方各国不约而同地致力于经营海上交通与海洋贸易。没有它们的共同努力,连结东西方的海上丝路就繁荣不起来。15世纪以后,人类历史发生重大变革,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荷兰、英国等“大西洋——波罗的海”国家,在“黄金热”“香料热”“世界热”中相继进行全球性海上扩张与殖民活动,开启了“地理大发现”与世界海洋贸易全球化新时代。而日本、东南亚海商在亚洲东部的海洋贸易中,也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。

自此之后,欧美主要国家都与中国、印度及东南亚各国建立不同形式的经济和政治关系,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了早期全球化的新阶段。

得赞誉。他用诗意的笔触渲染道,中国丝绸如果绣上各种色彩的图案,从最生动的到最温馨的,从橘黄色、紫荆色,到无论多敏锐的感官也无法准确定义的,如渐渐暗淡的玫瑰花色、色雷斯鹤的色彩、海水的颜色抑或奇幻的色彩。大诗人心中一种奇妙无穷的感受油然而生:

“万里无云,温和的西风带着潮湿的气息徐徐吹来。”

继罗马人之后,阿拉伯人是中世纪东西方海洋贸易的主力,他们的商船频繁从阿曼、锡拉夫、法尔斯和巴林海岸、乌布拉和巴拉远航至印度、东南亚和中国。

中国是西方世界向往的东方大国,中国商人在亚洲不少地区拥有雄厚的势力。中国产品如丝织品、陶瓷、茶叶等,在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。唐宋时代浙江、湖南、广东等地生产的青瓷和白瓷远销东南亚、印度、阿拉伯、东非及欧美地区。清代中国茶叶风行欧洲。在海外贸易中,中国也获得了大量的进口商品,如象牙、珠玑、香料、药材等,大大丰富了民众的社会生活与

经济生产。

16世纪,意大利人发明的用伊斯兰方法仿制中国白瓷的技术,在西欧普及。1709年,中国白瓷的秘密在德累斯顿附近的海森得以重新发现。1752年,用煤烧窑结合容形的改进在都柏林出现,使窑温很快达到烧瓷的高度,无烟窑氛让瓷器的洁白得到保障,中国瓷器得到大量自由仿制,一个欧洲陶瓷业新时代来临了。

造纸术是8世纪中叶从中国传入中亚重镇撒马尔罕的,后来在巴格达等地相继出现了造纸厂,白纸和彩色纸都制造出来了。大约公元900年或更早一点,埃及建设造纸厂,摩洛哥大约在1100年,西班牙在1150年,先后设厂造纸。十二、十三世纪的时候,造纸术继续从穆斯林世界的西班牙和意大利,传入基督教世界的欧洲,对中世纪晚期的西方走向近代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。

程颐兄弟)若朱(熹),皆深通佛教者,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,足以救中国之缺乏,而又忧其用夷复夏夜,乃求得两全之法,避其名而居其实,取其珠而还其椟,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《四书》《五经》,佛之义理,与儒教之宗传,合而为一,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。

在人类文明史上,“海上丝绸之路”作为世界各国各民族交往的主要渠道之一,书写着世界历史发展、文化交融的华彩篇章。而中国既在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,也由此获益良多。借用陈寅恪先生的上述论断,我们也可以说,海上丝绸之路,“实有功于中国甚大”。

作者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所长、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,《海洋史研究》主编,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、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等职。著有《明代海外贸易制度》《濒海之地——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》《海上丝绸之路》(“南海1号”与海上丝绸之路)等作品,部分已译成多种外语出版。

皇家园林探秘

当康熙帝爱上畅春园(下)

文 / 阙红柳

康熙皇帝修畅春园的初心,是在山水上佳的京城西北郊,有一处休闲疗养、乐享天伦的秘密园林,而它最终有别于一般私家园林的根本特点,还在其御园的政治属性。

园居而不废政事,此乃康熙帝力行不怠的作风,他曾总结:“朕明政三十年,夙兴夜

皇城西北“副中心”

康熙帝在畅春园园处理的政事种类繁多,包括臣僚觐见、任命官员、庶吉士散馆(结业考试)、阅兵武备骑射、赐宴蒙古王公大臣、接见外国使节等等。

翰林等官员轮值南书房,是康熙朝政治的特色之一。康熙三十三年(1694年),该制度形成,轮值的翰林除了帮助皇帝处理章奏外,还相与吟诗唱和,是玄烨忙里偷闲、放松休息的好助手。好学上进的皇帝平日跟才识丰赡的汉人翰林们切磋交流,不仅增进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,还能进一步笼络、控制汉臣。畅春园内建有南书房值庐,皇帝驻蹕时,原在紫禁城内当班的南书房词臣,按照惯例也随从入值。

畅春园远在西郊,朝臣赴园办理事务,往往天还没亮就要出门,晓出暮归,备极辛苦。如万仕康雍乾三朝的官员甘汝来所述:“黯淡星光玉漏迟,忽忽夜出便门西。远灯明灭依荒寺,春水澄鲜淡绿溪。月到树头惊犬吠,梦回马上听莺啼。最怜曙色依微里,麦垄才过又柳堤。”

大半辈子生活在康熙朝的著名文人查慎行也说过:“三月十八日,晓出西便门,至畅春园天始明。”为了公务方便,畅春园周

寐,有奏即答,或有紧要事,辄秉烛裁决。”

随着皇帝驻留畅春园之时日一年多于一年,园居理政由权宜渐转为常态。自康熙二十七年(1688年)始,玄烨在畅春园内的听政地点定为澹宁居。以帝王为绝对核心的专制王朝,其内廷决策场所往往随皇帝行止而不时发生变化。康熙一朝,畅春园成了紫禁城外的又一处权力中枢所在。

围开始修建一些小型园林,作为官员们临时休息的场所,也有不少官员在西郊一带赁屋居住,无形中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。

康熙帝在畅春园处理的繁复政务之中,又以民族事务以及对外事务为重。为加强满蒙关系,他多次于畅春园赐宴外藩蒙古,并逐渐形成定例,赐宴场所含淳堂、万寿亭、万树红霞、九经三事殿等处。畅春园也每每成为接见外国来使之地,如康熙五十九年(1720年),在畅春园的九经三事殿,康熙帝接见了葡萄牙使臣斐拉理、罗马教王使臣嘉乐等。除各国使臣外,来华传教士如白晋、张诚、李明、马国贤等,同样得到允许出入畅春园,为畅春园的历史平添了些许国际色彩。

畅春园在清廷政务活动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,政治地位也不断提高。自康熙四十四年(1705年)起,皇子允祉报告皇父的奏折中,畅春园与京城并列。康熙五十三年(1714年)修订历法,畅春园和观象台同为测验地。制定历法以北极高度、黄(道)赤(道)距度的数据最为紧要,而这些数据,康熙帝均令于畅春园内逐日测量。



清代画家所作玄烨便服写字图。康熙帝热衷中原传统文化,更多是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,畅春园成为其宣扬满汉一体文化政策的殿堂。

“文化天子”买人心

对酷爱传统文化的康熙皇帝来说,畅春园既是读书学习、修身养性之所,亦为其推行“崇儒重道、稽古右文(总结古代经验,弘扬文化教育)、满汉一体”文化政策的殿堂。借助园林营造的自然生态空间,康熙帝试图将个人文化修养的提升与清王朝的文化建设紧密关联,力求营造传承和发扬传统的人文环境,进而实现“教化天下”的大目标。

康熙帝与诸皇子均读书畅春园中,园内成为一处比较集中的皇家藏书处,佩文斋、渊鉴斋、讨源书屋、清溪书屋等处,均有大量藏书。畅春园也是康熙帝的修书处,他在位期间园内编修了数部大型书籍。如蒙养斋原为皇子们读书的地方,后来康熙帝命一批从全国征召来的著名学者,如方苞、魏廷珍、何国宗、梅毂成、明安图等,集中在此处编纂书籍,蒙养斋变成了临时性的修书机构。

在畅春园内,康熙帝就编修律吕(中国古典音乐)、历法、算法三书的具体问题,与学者们充分讨论交流。康熙六十一年(1722年),《律历渊源》一书全部完成,共一百卷,由《历象考成》《数理精蕴》《律吕正义》三部分组成,康熙帝很满意,只可惜未来得及颁发序文,他就驾崩了,该书直到雍正朝才正式刊印。

此外,《佩文韵府》《渊鉴类函》则分别修成于畅春园内的佩文斋、渊鉴斋。以佩文斋冠名的官修书籍还包括《佩文斋咏物诗选》《佩文斋广群芳谱》《佩文斋书画谱》等。据康熙帝文学近臣高士奇记述,他还曾在畅春园中编辑“方略”,即记录本朝军政大事尤其是平定叛乱军事行动的档案汇编。

康熙帝比较尊重并敢于提拔使用汉族上层知识分子,畅春园还是康熙帝赏赐汉臣的重要场所。游览畅春园是对汉臣至高的奖赏,如高士奇59岁时告老还乡,康熙让他遍游畅春园,赐给他酒和亲笔书写的“莱衣昼锦”四字,以表彰其衣锦荣归。

园内赐宴,是赏赐的另一种方式。康熙三十四年(1695年),曾当过玄烨的老师及《康熙字典》总裁官的陈廷敬五十八岁,奉召赴畅春园,赐食瑞露轩。赐御书,是又一种恩赏。康熙帝常在佩文斋做书画,赏赐汉汉臣。

畅春园内各式各样的赏赐活动,不仅表明了康熙帝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文化态度,也体现出皇帝与汉臣之间的情感交流。如在平定三藩、统一台湾过程中出力甚多的大臣李光地,在呈送给康熙帝的奏折中,对蒙恩赐见畅春园便感激涕零:“此月(指康熙五十年十二月)初二日,蒙于畅春园赐见,龙颜霁悦,天语温和,亲观臣病患所在,殆非臣下所克承当。”

此乃玄烨巧妙利用风景佳胜的畅春园,加强与朝臣,尤其是声望及地位较高的汉臣之间的近距离互动,并引以为示范,昭告天下:

满洲天子与汉人大臣和睦相处,协力同心。

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,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,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研究中心研究员。专治清代学术思想史、历史文献学及皇家园林文化,撰有《清初私家修史研究——以史家群体为研究对象》,主编《海外三山五园研究译丛》(畅春园研究)等。